

特拉斯会是怎样一位英国首相?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朱联璧

47岁的英国前外交大臣特拉斯当选执政党保守党党首,继而就任英国首相,成为英国历史上继撒切尔夫人、特雷莎·梅之后的第三位女首相。她上台后面临哪些困难?她会是怎样一位首相?本期“论坛”特请专家分析。



朱联璧

1 国内经济问题最为棘手

问:特拉斯执政前景并不被看好,她上台后面临哪些困难?

答:特拉斯面临的困境可以分成亟待快速解决的现实问题、自身的劣势和保守党的低支持率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就现实问题来说,在内政领域,包括已经延续近一年的生活成本危机、继之而起的高通胀和当前尤为紧迫的能源危机。对于英国首相来说,国内经济问题的重要性最高,因此这是摆在特拉斯面前最棘手的问题。在内政和外交交叉的“脱欧”问题上,除了与欧盟的后续谈判,还包括有待议会讨论和通过的《北爱尔兰协定法案》。在外交领域,在位长达七十年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去世

后,英国和个别英联邦国家的关系面临挑战。此外,当选首相之前身为外交大臣的特拉斯在国际关系领域十分活跃,以对俄强硬姿态著称。面对严重的能源危机,是否要调整对俄关系,也是特拉斯需要考虑的问题。

就自身劣势而言,特拉斯被不少人认为是政治立场多变、人格魅力单薄、议会辩论技巧生硬的政治家,同媒体的关系也不算密切,和前首相约翰逊形成鲜明对比。她从当选下院议员到担任首相仅仅用了12年时间,党内根基不如前首相特雷莎·梅深厚。再者,她出身平民学者家庭,和贵族阶层关系疏远,不像前首相卡梅伦通过婚姻与上流社会

建立了联系。在保守党党首前四轮选举中,她也没有展现出压倒性优势,因此不少人预言她是一位“短命首相”。甚至在她担任首相一周之后,政府职位调整还未完成,也可见党内对她支持力度不算高。

目前保守党低迷的支持率,也让保守党上层倾向于按期在2024年举行大选。此轮保守党支持率的下跌势头在2021年12月生活成本危机开始后显现,加上约翰逊政府大量成员不遵守疫情期间防疫规定被调查,叠加2022年春季以来的能源危机和高通胀,让保守党支持率下跌到十年来的低点。对特拉斯来说,不提前大选固然能让她暂时稳住相位,但同时让她失去了将下院保守党议员转变成自己支持者的契机,从而进一步增加她推行新政策的难度。

2 和君主制关系更为紧密

问:曾想废除君主制的特拉斯会不会趁女王去世之机对王室下手?

答:特拉斯确实在大学期间表达过要废除君主制的看法,但无论是当时英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还是她当时的政治立场,都和今天完全不同。在特拉斯向君主行屈膝礼表示愿意组阁之后,她已经成为君主立宪制的一部分。而且,支持君主立宪制是保守党一贯的观点。

伊丽莎白二世离世后,哀悼旧主、迎立新君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会面临不同的舆论。许多英国和英联邦民众就算不认可君主制,但对伊丽莎白二世个人有好感,不会在这个阶段表达反对王室的情

绪。对英国的民族主义者来说,各国官方媒体和社交媒体对女王之死的大幅报道,是英国软实力的体现,符合他们的心理需求,也有助于塑造年轻一代对女王的集体记忆。加上由此带来的直接经济收益(尤其是旅游业),都会遏制反对王室的声音。女王在苏格兰离世,让苏格兰人民有机会表达对王室的认可,可以作为未来否决苏格兰第二次独立公投要求的依据。特拉斯本人作为高寿女王末代首相的身份,使她象征着两代君主之间的连接,她自己和君主制的关系也更为紧密。

在哀悼环节结束后,英国国内外舆论对君主制的看法确实有可能

出现负面转向。新君登基和晋封储君尽管也会成为媒体焦点,但如果能源危机和高通胀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民众可能会对大型仪式的巨额公共开支和对日常生活的影响表示不满,会对接连不断的报道感到疲劳。如果新君履职后无法满足民众预期,抨击王室的声音会随之而来。

然而,对王室的不满不等于君主立宪制会因为民意迅速瓦解。因为王室本身不是民意的产物,是历史延续性的体现,也是英国国家认同和民族主义的基石之一。要用民意和世俗权力来挑战有血缘性和宗教性的权力,需要在法理、舆论和运作层面都有充分准备之后才能进行。对于特拉斯这样一位能力不被看好的首相来说,保住来之不易的相位,远比废除君主制来得重要。

3 纾困方案欲解能源危机

问:特拉斯在内政外交两方面会有什么举措?

答:对于新任首相来说,上任之初最重要的工作是明确下一阶段的经济方案,同时通过外交活动为英国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与历任前首相不同的是,特拉斯上任仅三天就遭遇君主逝世这一重大变故,为新政府带来了额外的挑战。

特拉斯政府在内政上将采取的最重要措施,是解决约翰逊政府遗留的能源危机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政府预算,缓解民众对保守党的不满。约翰逊提出为每个家庭提供400英镑补助的纾困方案,但对不少家庭来说并不足以解决问题。特拉斯提供的纾困方案更为激进,还要配合一套减税计划。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她将践行撒切尔政府时期采用的哈耶克式自由主义政策导向,坚持小政府模式,由市场自身完成调节,化解危机。

特拉斯这套解决能源危机的方案以英国政府相对较低的负债水平为前提。保守党2010年上台执政后,以缩减公共开支的方式不断降低政府负债水平。疫情暴发后,前财相苏纳克为英国各界提供了多达3760亿英镑纾困资金,是2007年至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英国政府提供的纾困资金的三倍规模,放弃了保守党降低负债的政策导向。特拉斯计划在此基础上追加1500亿英镑债务来解决能源危机,政府将连续两年为每个家庭设置2500英镑能源账单上限,超过部分由政府先行支付,未来由纳税人以缴税形式返还。特拉斯认为,此举不仅能帮助民众渡过难关,也能避免政府向在能源危机中赚得盆满钵满的能源巨头征收额外税款,助力这些企业进一步投资。与之配合的减税计划,同样以带动消费、盘活经济为目标,为市场注入活力。

这一看似惠民又周到的方案确实可能帮助英国在短期内改善通胀

数据,但对穷人帮助很小,因为政府设定的能源开支上限是普通英国家庭往年能源开支的2.5倍,账单依然足以给贫困家庭带来巨大经济负担。真正能从中受惠的是富人家庭,让他们以分期方式支付未来两年额外的能源开支。不向能源巨头收税则只能保障这一群体的经济利益,不能保证他们将盈利转化为投资拉动经济循环。加上英镑近期兑美元汇率依然在较低水平,对相当依赖进口商品的英国来说,进一步降低物价的难度加大,必须采取其他手段来缓解通胀、降低生活成本和避免可能出现的经济萧条。

再看外交。即将在19日举行的女王国葬,将成为特拉斯出任首相后的外交首秀。不过,这场仪式的主角毕竟是王室,因此特拉斯很难借机安排与其他政府首脑之间一对一的对话机会。女王丧礼结束后,特拉斯会前往联合国参加峰会。因此,以她本人为主角的外交活动,需要过一段时间才会出现在大众视野中。

在对欧事务方面,特拉斯在议会7月休会前提出的《北爱尔兰议定书法案》旨在解决“脱欧”事务中的关键问题,目前计划在10月12日进行上院二读。该法案的条款如何订立,将影响英国、欧盟和美国之间的关系走向。特拉斯和约翰逊不同,并不是一位以“疑欧”为自身品牌的政治家,因此不排除未来会在“脱欧”问题上有所让步。

就与英联邦国家的关系而言,尽管已有加勒比国家提出要举行公投放弃君主立宪制,但并不意味着它们必定脱离英联邦。这和英联邦原本就是相对松散、政权性质多样的跨国组织有关,如果这些国家想保留和英国政府合作的渠道,可以仍留在英联邦之内。对特拉斯来说,如何根据英国的需要来调整和英联邦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实现“全球英国”愿景的外交前提。

波兰为何突然对德国提出巨额二战赔偿?



王弘毅 欧研究中心研究员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东

波兰近日正式向德国提出6.2万亿兹罗提(约合1.32万亿美元)的巨额二战赔偿要求,令国际社会关注。时值俄乌冲突再现变局的关口,波德两国又同属欧盟阵营,波兰为何将“矛头”指向德国?

索赔引发波德争辩

83年前的9月1日,纳粹德国闪击波兰,一个多月后,波兰亡国。

83年后,波兰在对德国提出巨额索赔的当天,还发布了一份名为《关于1939—1945年二战期间波兰

因德国侵略和占领而遭受损失的报告》。该报告历时5年出炉,由包括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档案专家、律师等在内的33名专家参与撰写。报告称,据保守估算,德国应赔偿波兰约合1.32万亿美元战争损失。

报告一经发布,便在波德两国乃至整个欧洲引发有关历史叙事的争议。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之所以被重新提及,除了经济补偿本身的意义之外,安全和政治层面的弦外之音或许才是波兰的根本目标。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波德争议背后乃是欧洲的记忆裂痕。

在不少波兰人看来,德国是二战的始作俑者,波兰则是二战的最大受害者。波兰至今在人口、经济、基础设施、科学发展以及教育等多个领域相对滞后,与二战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关系紧密。基于此,波兰认为“战争罪是不受时效限制的罪行,德国入侵波兰并造成了损害,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们在道义

上有要求赔偿和补偿的权利”。

德国外交部回应称,波兰在1953年已经放弃进一步赔偿,并多次确认这一立场。但波兰驳斥这一叙事,强调1953年波兰政府是在苏联压力之下被迫放弃赔偿,不能代表波兰人民的真正意愿。

波兰的经济索赔并非只是纸上谈兵,而是动了真格。波兰执政党高层认为,赔偿将是长期过程,而不是一两年内就可以完成,波兰做好了长期争取的准备,分期赔偿方案或可成为一个选项。

裂痕预见欧盟未来

相比于经济索赔实现的概率,波兰获得安全和政治回报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

从安全动机来看,波兰意欲借此唤醒二战的惨痛记忆,提醒和警告东欧乃至整个欧洲目前面临的严峻局面,敦促以德国为代表的一些欧洲国家应对俄罗斯采取更强硬、

更连贯的孤立政策。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德国等国在对俄立场上与美英以及东欧多国“温差”明显:德国长期拒绝对乌提供致命性武器,匈牙利继续开展对俄合作,捷克等对俄原本强硬的国家则因能源问题面临改变对俄政策的民意压力。

就政治考量而言,法律与公正党在波兰执政将满8年,明年议会选举将是决定其能否长期执政的大考。如果法律与公正党能够赢得第三次选举,波兰的现行发展方向不仅将进一步固化,外交政策的保守化也难以逆转,这对内部矛盾重重的欧盟无疑是重大挑战。波兰与欧盟在司法、能源等问题上分歧正逐步加深,在乌克兰难民和经济财政上承受的压力也逐步增加。

自2015年法律与公正党执政以来,波俄和波德之间的战争记忆被重新激活。波兰此时重提二战赔偿问题,一方面可以调动民族主义情绪,增强民族认同感,巩固选民基

础;另一方面可以在欧盟获得一份基于“受害者”身份的道义权利,换取德国以及欧盟对波兰国内问题的妥协与让步,使波兰摆脱在欧盟被孤立的局面,甚至迫使德国同意在欧盟内向波兰让渡更多权力。

波德国绕战争赔偿的争议,折射的不仅是两国间的记忆裂痕,也是欧洲现实政治的缩影,将这一缩影投射到波俄关系中依然适用。譬如,俄罗斯作为二战受害者的叙事与创伤记忆,就遭到波兰的坚决抵制。在波兰看来,俄罗斯和德国都对波兰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而俄乌战争的持续扩大,以及德国对俄制裁行动的迟缓,都加剧了波兰的“恐俄症”,进而放大了对德国的不信任感。

不应忘记,与波兰有着相似战争创伤记忆的国家,还有波罗的海三国、捷克、斯洛伐克等中东欧国家。记忆裂痕不仅留存于当下,更将预见欧盟的未来。